

Reading the Mirrors of History

歴史の鏡を読み解く

역사를 보는 또 다른 눈

另眼看历史

另眼看歷史

上

呂正理 著

——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互動歷史

另眼看歷史

呂正理 著

——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互動歷史

另眼看歷史

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互動歷史

■ 上冊 □

作者——呂正理

出版三部總監——吳家恆

執行主編——游奇惠

封面設計——邱睿緻

地圖改繪——楊景涵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0南昌路2段81號6樓

電話／2392-6899 傳真／2392-6658

郵撥／0189456-1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初版一刷——2010年7月1日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新臺幣780元（全套）／390元（上冊）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32-6663-1（全套）

ISBN 978-957-32-6664-8（上冊）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 ylib@ylib.com

王汎森序

我第一次見到呂正理先生是在去年的二月農曆年前。呂先生經由朋友介紹與我見面，出示將近一千頁的《另眼看歷史》打印稿，並告訴我，這是他花了兩年時間寫成的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交織歷史。當我問起呂先生的背景，得知他並不是專業學歷史，而是長期從事於企業經營及顧問工作，不得不感到十分驚訝。

我平常有些忙，但在農曆過年期間剛好有些空閒，於是匆匆地翻閱了部分的章節。由於呂先生的著作內容太廣，其中有很多部分並不在我所熟悉的範疇之內，因而我建議他另外找人核實史料。呂先生遂與一組青年歷史學者在一起工作，逐章討論了將近一年。現在書稿已成，呂先生請我寫幾句話。

呂先生寫這樣一本書，在我看來，除了對歷史的愛好以外，似乎是一種使命感在背後驅策。關於這一部分，他自己在〈自序〉裡寫得十分清楚，我就不再重複。不過我要特別指出，呂先生試

圖從研究思想和社會價值觀演變的角度來剖析歷史的過程和脈動，這是一個有意義而值得鼓勵的方向。

此書有幾種特色：首先，目前史學界以專題論述為主，即使是成書的著作，往往也是特定主題的 monograph，較少有人寫通貫性的歷史。《另眼看歷史》即是一本通史性質的書。第二，過去有幾本「東亞史」之類的書，但是大體上是以一國一章的方式鋪陳，而《另眼看歷史》則是以中、日、韓、台及周邊世界交織互動的方式進行，故比一般東亞史更具特色。最近我開始注意到除全球化、在地化之外，還有一個愈來愈重要的現象——「區域化」。本書把中、日、韓、台寫在一起，並與周邊世界相連結，可說有先見之明。

許多年來我都很欣賞美國史家卡爾·貝克（Karl Becker, 1873-1945）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家父因為受到我的鼓勵，曾經試著把一九二〇年代後期以來所見所聞及生命歷程寫下，可惜他動筆一段時間之後中輟。此外，我也一直在提倡「面向大眾的歷史學」。我之所以這樣想，主要是認為知識有它的社會責任，以歷史來說，如果這世界上多一個人瞭解自由民主發展的歷史，不是更有助於推動民主政治嗎？能多讓大眾瞭解一些歷史，不正是這門學問的意義所在嗎？

清代考證學壟斷全局很久，到了清代後期有名的學者陳澧便表達了他的不耐，提出「以淺持博」的呼聲，「持」是輔助的意思，這個呼聲在當時並未受到足夠的注意，而且我覺得在清代考證學「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證據動輒千百條，各種文獻星羅棋布的考證學重圍中，陳澧的所謂

「淺」其實已經太深了。他大概認為他的《東塾讀書記》或《漢儒通義》已經是「淺」，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所謂「淺」只是對當時有學問的人而說的，和我們今天的標準有所出入。

今天在史學方面，我認為「以淺持博」觀念含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讓對歷史有興趣的人可以很快上手掌握相當程度的歷史知識。另一方面，是提供一個比較宏觀的架構，讓沒有餘力讀許多專門研究的讀者能較快速地掌握一個大致的歷史架構。就這兩個標準來說，《另眼看歷史》已經做到了。

由於呂先生不是專業史學家，所以對於最新的史學研究的成果，或許無法充分吸收；但是幾位專業學者加入討論後，已經有部分改善。對一般讀者而言，此書有許多可取之處，故藉本序表達上述的看法。

王汎森

二〇一〇年五月

【序者簡介】

王汎森，畢業於台大歷史系，留美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現任中研院副院長。

史欽泰序

我和正理兄相識，不過是最近這四、五年內的事。早年我的經歷大多和半導體、電子產業有關，而他是在化學業裡。兩個行業在當時交集不多（現在就多了），所以我們沒有什麼機會熟識。正理兄後來轉而從事企業顧問，又加入台灣玉山科技協會，而我忝為協會的會長，因而漸漸開始來往。正理兄是一個活躍的會員，但我從來不知道他對歷史竟然有很深的研究。這次他請我來為他的大作《另眼看歷史》寫序，實在是讓我有些驚訝。

我也算是喜愛歷史，誠如正理兄在書裡所說，不管是從事什麼行業，很少有人不喜歡歷史。但我自認對歷史的研究並不是很深入，要為這樣一本厚重的歷史書來寫序，覺得有些不敢當。不過正理兄一再重複他在〈自序〉裡寫的一句話：「以我個人的看法，比較現代企業的起落和歷史朝代的興衰，其間實在沒有很大的差異。」深獲我心，因而我只得當仁不讓，勉為其難來寫這篇序。

二〇〇四年起，由於清華大學的邀請和台積電的鼓勵，我在清華大學參與創辦了一個科技管理

學院，並擔任院長至今。科管院除了有經濟、計量財金、科技管理和科技法律等科系及研究所之外，也有專業的MBA、EMBA、IMBA等課程。眾所周知，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在三、四十年前開始有MBA課程，吸引了美國和全世界財經、科技界的青年才俊去就讀。MBA的課程裡，最重要的其實不是研讀各種教科書，而是所謂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選擇許許多多過去企業界曾經發生的個案，讓學生在老師帶領之下共同討論其之所以成功或失敗，而在其中借鏡，總結企業經營之道。MBA畢業的學生在企業界越來越受到重視，歐洲、亞洲的許多重要學府也都跟著開辦MBA課程，台灣也不例外。

東、西方的文化原本就有些不同之處，東、西方的企業經營哲學，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我們很早就發現，如果把一些歐美的企業個案直接搬到亞洲的MBA課程來討論，事實上有一部分並不適當。這些年來，清華科管院也逐漸選了一些台灣、大陸企業的個案在MBA課程中研究討論。發展至今，有一部分的個案也被哈佛大學MBA課程引用，例如台灣ASUS公司發展Eee PC的個案，以及最近推出的聯發科發展山寨版手機晶片個案。

我十分同意正理兄的一個看法。他認為在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所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對於MBA學生必定也具有啟發性，甚至更加有趣，更有深度。舉例來說，十一世紀下半，有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中國北宋的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進行變法。這一場號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變革最後卻不幸徹底失敗。到了十三世紀初，又有一個更大的歷史事件發生，原本是草原上棄兒出身的成吉思汗竟開創了一個空前絕後的蒙古大帝國。

王安石為什麼會失敗？成吉思汗為什麼會成功？在這本《另眼看歷史》裡分別有專章討論，相當精彩。不過對於這兩個事件，我相信不同的人必然有不同的分析和見解，不一定會和正理兄一樣。但我想像如果把這兩個事件拿來放在MBA課程上做Case Study，絕對會討論得轟轟烈烈。

話說回來，歷史事件並不是只有歷史學者可以研究，或是在MBA課程裡才值得討論。我相信，不論是什麼職業，什麼身分，什麼年紀，歷史對所有的人都是一片豐沃的土壤，有許多養分可供汲取。

但歷史書如果與史實相差太遠，不免反而誤導讀者；又如果寫得過於艱深、堅硬，對一般讀者不免有些障礙。正理兄在序裡說希望盡量求證史實，又想要把這書寫成是一本給一般大眾看的「史普」書，像「科普」書一樣，易讀而有趣。這本書是否已經達到作者自己訂的標準，我想就讓讀者們去評定。不過將來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寫這樣的「史普」書，那麼讀者們就有福了。

史欽泰 謹識

二〇一〇年六月 於新竹清華園

【序者簡介】

史欽泰，畢業於台大電機系，留美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曾任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現任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長。

自序

首先我必須說明，我並不是專業學歷史，只是在業餘喜好研究歷史。在我成長的年代裡，台灣大部分的學生上大學都是優先選擇理、工科系，我也不例外。但我很早就對歷史感到興趣。在我小學時，台灣大部分的人家都還沒有電視，但我們家幸而有一台收音機。當時在中廣電台裡有一位姓林的老先生每天晚上講《三國演義》，我也每晚睡覺前打開收音機，收聽播放，和弟弟、妹妹們各自窩在棉被裡，聚精會神，聽得津津有味。

我們家在一個小鎮上，每逢節慶就有戲班在幾個廟前演出，有攤販、藝人從四處來。也有「說書人」來到，擺攤子說故事，連續好幾天，內容有「水滸傳」、「岳飛傳」、「火燒少林寺」等。說書人身穿一襲長袍，道具只有一張桌子、一塊驚堂木、一把折扇，但腔調抑揚頓挫，加上誇張的表情、手勢，真正是引人入勝。說到重要關節處，說書人就拿著帽子請圍在四周的聽眾一一丟錢進去，等收完後才又繼續開講。在這期間，我總是每天抱著一張矮凳前往，坐在前面，聽得流連忘

返。

我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並沒有因為讀理、工科系而減少。今日有許多非文、史科系畢業的人士對歷史也抱有同樣的興趣，我猜想可能也是從小培養出來的。事實上，我很少遇到不喜歡歷史的人。

我後來所從事的工作，大抵都和企業經營有關，因而很自然地開始注重研究歷史朝代的興亡，而尤其對於亂世的研究情有獨鍾。以我個人的看法，比較現代企業的起落和歷史朝代的興衰，其實在沒有很大的差異。回顧過去三十幾年，我必須承認我所犯過的錯誤非常多。同時，我也看見許多多的企業不斷地在重複同樣的錯誤和失敗，而這些錯誤其實在過去的歷史人物身上也都不斷地發生過。因而，歷史讓我在工作及生活上得到許多啟發，也帶給我無窮的樂趣。我總想有一天要回饋，把自己對歷史的見解也貢獻給別人，因此就大膽地寫了這本書。不過我並不打算寫成一本教科書，或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要寫成給一般大眾看的「史普」書，希望像我喜愛的一些「科普」書一樣，易讀而有趣。

我寫這本書的第一個目標，是要寫一本客觀而簡要的通史，把中國、日本、韓國、台灣等國家或地區裡各個民族的起源、朝代興衰，以及歷史上的雙邊或多角互動關係都包括在裡面。我之所以希望寫這樣一部多角的歷史，是因為我發現我所讀過的單一國別史大部分都流於主觀，在敘述本國與別的國家互動的經過時多多少少有些偏頗。如果寫某一國的歷史，這個國家就是主角，別的國家都是配角，而有意無意地把別國與本國相關的大事略過，甚至歪曲了。我在想，如果能把幾個不同

國家、地區的歷史寫在一本書中，或許可以逼使作者不得不把重要的歷史事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出發，因而能比較客觀地敘述。

英國的「科幻小說之父」喬治·威爾斯（H. G. Wells）也曾經寫過一本通史，書名《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實際上是偏重於歐洲地區的歷史。威爾斯寫這本書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戰爭顯然使得他心中有許多感受，因而動筆。威爾斯認為，當時的歐洲人在學生時期從學校裡學到的都是偏狹的歷史。他在自序裡這樣寫：「他們是被蒙上民族主義的眼罩來學歷史的，除了自己的國家以外，一切國家都視而不見。」

我讀了這段話，心有戚戚焉，因為我認為威爾斯所描述的情形也適用於今日的亞洲。

一個人如果只讀自己國家的歷史，而對別國的歷史所知有限，通常不會知道一個發生在本國的歷史事件究竟會對另一個國家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很少人會聯想到，本國人民所歌頌的豐功偉業，常常是由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付出代價。不同國家的人民如果對歷史的認知不一樣，而有不同的解讀，自然就很難不被各自所築起來的狹隘民族意識所束縛了。只有當人們能夠客觀而完整地瞭解自己的國家與別的國家之間歷史的交錯發展軌跡，才有可能如威爾斯所說：「對於過去的事物採取一種通觀全局的看法」。

當然，寫歷史要做到真正地客觀並不容易。歷史家也常常面臨許多以往的歷史記載並不可靠的問題。既然史料已經有了偏差，歷史著作如何能做到客觀呢？

實際上，史料有種種不同的來源，其中可靠程度不一，有些可以互相印證，卻也有許多是指到

相反的方向。我們如果能夠就某一特定的歷史事件的相關史料進行仔細的蒐集、查證、對比、分析，其實不難得知一些歷史記載究竟是虛構的，是誇大的，或是充滿了謊言。當不實的史料漸漸地被排除，留下來的就越接近史實了。古今中外有許多歷史家正是以追求歷史的真相為一生的職志。

史料其實也不只限於歷史著作。清朝著名的史學家章學誠曾經提出一個「六經皆史」的說法，主張《六經》其實就是孔子生活的時代和在他之前千、百年間的重要史料。舉一個例，《詩經》便是蒐集了商、周及春秋時各諸侯國的廟堂雅樂及民間歌謠，內容十分豐富，有大軍出征打仗，也有婦人埋怨丈夫出征不歸；有國家的隆重儀典，也有陪葬的慘劇；有販夫走卒辛苦的生活樣貌，也有男女相戀的羅曼蒂克。《詩經》因而絕對是一項材料非常豐富而真實的史料。

「六經皆史」的觀念可以更廣泛地應用。任何有文字的材料，甚至沒有文字的古蹟古物也都是史料。近代考古學家挖掘古文化的遺址，研究古墓的陪葬物，又挖出千百年前以各種文字刻石記載的紀念碑，破解其中的文字之謎，在在使得史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可信。也有學者應用天文學、氣候學、語言學、遺傳學、人類學、基因圖譜等來解決過去傳統考證所無法解決的古代歷史問題。這些都使得歷史的研究越來越有趣。

我寫本書的第二個目標，是希望探討各種不同的思想、宗教及價值觀。本書第一卷到第五卷一共有三十一章，都是在敘述從遠古到近代的東亞綜合歷史，但其中第四卷有六章是專門用來說明各種思想、宗教及社會價值觀的起源、發展和演變，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重要思想，以

及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等宗教如何產生？如何傳播？如何壯大？如何發生衝突？這些又跟歷代政治、社會的演變有什麼關係？

我之所以要花這樣多的篇幅來探討思想及價值觀，是因為我深信凡人的一言一行，除了來自於先天的性格以外，無不受到那個時代的思想潮流及社會價值觀的重大影響。因而，生長於現代的人們若要真正瞭解歷史人物的行為，以及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和始末，必定要明白當時的思想及價值觀。如果一個人在研究歷史時總是以現代的思想及價值觀為標準來評斷古人古事，在我看來，只能說是膚淺而失之公允。本書這一部分章節的主旨，就是希望能夠還原歷史，幫讀者「回到過去」，從而能掌握到歷史發展的脈動。

話說回來，現代人對於古代「人」的思想及行為雖然要能充分地理解，對於古代人所視為當然的「思想及價值觀」卻必須分開來看待，並且謹慎地想清楚是否適合於現代，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更進一步地說，現代的主流思想及價值觀也未必永遠正確，而我們都受其左右，受其引導，受其束縛。因此，人們如果能夠將眼光放得更長、更寬，放在更高處，或許對某些現在的事物會有不同的看法。

學歷史的人總是說要從歷史中借鏡，我不免也要把從歷史借鏡當成寫作本書的第三個目標，並加入自己的觀點，提供給讀者們參考。本書第六卷裡的四章，以及第七卷裡的五章，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嘗試。

七世紀時，開創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曾經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

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句話說得極為透徹，而通曉中國歷史的人大多耳熟能詳。我個人認為，國家之所以會滅亡，絕對是因為有人在很久以前做錯了什麼事，種下了遠因，並且在關鍵時候又有人犯了更嚴重的錯誤，引爆事件。人物得失與國家興亡因而往往是同一件事。我們如果要向歷史借鏡，重點其實應該是在分析、歸納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的遠因、近因、結果，以及其後續的影響。如果類似的歷史事件之所以重複發生是根源於某些驅之不散的特定思想及價值觀，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更深層地去討論這些特定的思想及價值觀。

本書前面五卷的文字既是敘述歷史，那麼我便要求自己必須嚴謹，希望多方參考不同來源的史料，做到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個故事都是客觀的而有根據。假如我不是十分肯定，我會盡量保留，或在書中交代清楚。

本書後面兩卷雖是我對歷史事件、人物、思想及價值觀的評論，代表我自己的看法，但我還是希望盡量避免站在某一個國家、民族或個別族群的立場來下筆，或依據某一特定的意識型態來論斷。很幸運地，我們這一代的人大多是生活在能夠容忍多元思想的社會裡，因而我並不期望讀者們都能接受我所有的論點和看法，不過如果有讀者願意提出不同的意見來與我分享，我將十分感謝。

是為序。

呂正理

二〇一〇年春，於台北大屯山下

誌謝

我之所以能夠完成這本書，必須要謝謝很多人，而最要感謝的是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先生。王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歷史學家，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而我與王先生原本是素昧平生。我在花了約兩年時間完成本書的初稿後，經人介紹，前往求見王先生。我雖不是專業學歷史，對於這本書卻有相當的期待，十分在意內容是否足夠嚴謹，下筆是否足夠客觀，是否有什麼不應該有的錯誤。當時王先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我久仰其大名，冒昧地請求王先生給我指導。

很意外地，王先生看了我的初稿之後，不只給我許多意見和鼓勵，還提出建議，說由於這本書的範疇很廣，最好是請一些研究各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來分別提出意見，而他也樂意幫我安排。一位素賦名望的學者竟然願意如此協助一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最後又為我的書寫序，真是使我除了感謝之外，不知道要再說些什麼了。

我其次要感謝的，是應邀來指導我的青年歷史學者，包括張藝曦先生（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在交通大學任教）、童長義先生（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現在台灣大學任教）、蔡宗憲先生（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王超然先生（台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裴英姬女士（韓國籍，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以及楊俊峰先生（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等；其中我特別要感謝小組的召集人張藝曦教授。這幾位後來都成了我的朋友，並協助我訂正了許多書中的錯誤。若是沒有這些各有專長的學者們，這本書裡的一些明顯的錯誤和遺漏恐怕在書出版後就會讓我自已羞愧不堪了。

今年三月後，又有一位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也應邀前來指導。王教授主要的研究範圍是中國西南和北方游牧部族的歷史，在這個領域是國際著名的學者。我在這本書中關於華夏邊緣的游牧部族方面的歷史著墨很多，不過坦白地說並不是很有把握，但由於王教授的指導，使得我信心大增，自認是幸運極了。

以上這幾位專家學者不但對我多有指正，也提出許多不同的看法和方向，使我從而能夠從更寬的角度深入地探討一些我原先沒有研究清楚的題目，部分章節甚至因而必須大幅改寫。雖然如此，這本書如果仍是有一些錯誤，當然是我本人要負全責，因為最後定稿的還是我自己。

我也要謝謝我的外甥女楊景涵。這本書裡所有的插圖都是她參考一些現有的地圖（部分是中國的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出版。在此特別要向已故的譚先生致敬），與我討論，然後重新修改而畫成的。希望讀者們在對照這些地圖和本書內文之後，對歷史的瞭解會更加深刻。